

敦煌學五十年

神田喜一郎撰、郭自得
王三慶合譯

眾所週知，廿世紀以來，各方面的學問都有了很大的進步，而我們所從事的東洋學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究其原因，最顯著的是中國、以及以中國為中心的周邊各地的調查、發掘頗為盛行，並且相繼發見了以前學者所夢想不到的新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從中國河南省殷墟出土的甲骨及其他的遺物。這些東西的發見，使大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發生了認識上的大轉變。與此殷墟出土物並列，也促使東洋學進步的另一項東西，就是今天所要講的敦煌古書。它是在甘肅省西邊的敦煌所發見的東西。更詳細地說，是在敦煌縣附近有座鳴沙山，在此有莫高窟——俗稱千佛洞的石窟寺，在這石窟寺中的一室發見為數甚多的古書。其中最古老的是三世紀末的。較後的也都未超過十世紀。大體上，是在中國印刷術尚未發達、寫本時代的東西。那種東西除了日本自古有若干的遺存外，在中國是完全失傳的，何況其數量竟達數千卷，因此，這一發見震驚了世界東洋學者固不待言的。發見者是英國的斯坦因（A. Stein）和法國的伯希和（P. Pelliot）這兩位先生，並將其中的大部份帶回歐洲，因此，對於敦煌古書一時引起很大的轟動。從敦煌發見的不只是書籍，還有繪畫及其他種種東西。不過，對本世紀東洋學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依然是書籍——敦煌古書。這一發見是一九〇七年的事。殷墟甲骨的發見稍早，在一八九九年。兩者從發見到現在都已經過了五十年左右。現在任職臺灣大學教授的董作賓先生是聞名的甲骨學大家，前年在臺灣發行的「大陸雜誌」曾刊載了他的一篇文章，題為「甲骨學五十年」，堪稱甲骨學的決算表。我今天的演講題就是效顰它的。事實上，敦煌學五十年，在年數上雖說稍嫌不足。然而，從這敦煌千佛洞發見眾多古書的最初契機，乃是在一九〇〇年，一名任職千佛洞的道教住持，叫王道士的，偶然發見在被封閉的一間石窟藏滿了書籍。對此雖然也有若干的異說，但是無論如何，古書從此成了主要的課題則是不爭的事實。斯坦因或伯希和等，不過是收買了王道士，順利的得到它而已。如此說來，敦煌也有了整整五十年。所以現在來說「敦煌學五十年」應無不妥。

提到「敦煌學五十年」——這一學問的興起，自然也有種種的來由。從前世紀末起，西洋人到中亞細亞去探險的逐漸增多。其最初的目的並非是爲學問。一八九〇年英國軍人伯爾（H. Bower）到中央亞細亞去旅行，從庫車（Kucha）帶回寫在貝多羅葉的梵文古經。經英國梵語學者侯恩勒（R. Hoernle）的研究，確定它是比我國法隆寺裏已被認爲世界最古的貝多羅葉經更古老。這一發現，使學界一時發生了騷動。終於藉此機緣，興起了以學問爲目的的中央亞細亞探險。進入本世紀後，便由英、法、德、蘇俄等國，相繼派遣了大規模、有組織的探險隊到中央亞細亞。關於這些探險隊，先前禿氏已有詳細的說明。他們都從這地方帶回各種古代的遺物。不用說，中央亞細亞位於中國與西方中間，是古來東西交通的孔道，因而繁榮了此地特有的一種文化。並且在此留下很多貴重的遺物。到了本世紀，針對那些遺物作研究的所謂中央亞細亞學便興盛起來。在法國的法蘭西學院於一九一一年三月始由伯希和先生開設亞細亞講座。所謂敦煌學，就是中央亞細亞學的一部份。然而，中央亞細亞學中敦煌學所佔的地位是很重的。因此，有時也以敦煌學的名義代表了中央亞細亞學。在我國所謂的敦煌學，似有廣狹兩義。今天，因限於時間，無法談到廣義的敦煌學，僅擬就狹義的敦煌學說說。

英國的斯坦因初到敦煌是一九〇七年三月，即日本的明治四十年，中國的清朝末期光緒三十三年。斯坦因在此前一年受命於英國印度政府，作第二次中央亞細亞的探險，調查各地的古蹟，而到了敦煌。在此聞悉從千佛洞發見了古書，終於寵絡了王道士，並得到了其中的數千卷。與此同時，自一九〇六年夏季起，法國的伯希和——當時任職法屬印度支那河內的極東學院（正確地說是遠東博古學院），受命於法國政府，從事中央亞細亞的探險。他繼斯坦因後，於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到達敦煌。而他也順利地收買了王道士，得到了斯坦因所遺留的古書數千卷。這是在一九〇八年三月三日起數日間之事。伯希和得到這批古書之後送回法國，自己於當年五月由敦煌出發東進，中途在西安待了一個月，經鄭州，於十月初抵北京。在此有個問題，斯坦因也好，伯希和也好，他們從千佛洞所獲古書，都全部分別送回英國及法國。其內容無人知悉，學界方面也對此一無所聞。據多數人的傳說，一九〇八年伯希和到北京時，曾將所獲千佛洞古書的極少部分披露於中國學者。這才引起了學界的喧嘩。然而，在中國與日本最先知道有敦煌古書之事，則在明治四十二年，即一九〇九年九月，大約已在一年後，這先後有些出入。也有說：伯希和到北京是在一九〇八年的五月。但這與他從敦煌

出發的時間不符，分明是錯誤的。伯希和到北京的確是在十月。此時伯希和並無任何動靜。對敦煌古書也裝著全然不知，而一度返回河內。以常識來判斷，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伯希和雖是獲得了敦煌古書，但尚未報告極東學院院長，在這以前當然不可能披露給在北京的中國學者。關於伯希和當時的動靜，詳查極東學院的機關雜誌便可了然。他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回到河內（參照遠東法國學院彙刊第八卷第三——四號五八八頁 B. E. F. E. O. Tome VIII N. os 3-4. P. 588），而翌年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一日再由河內出發，回到北京（參照遠東學院彙刊第九卷第二號四〇二頁 B. E. F. E. O. Tome IX No 2. P. 402）這次目的是代巴黎國民圖書館採購漢籍。至於將他所獲敦煌古書的極少部分披露給中國學者，是他從河內再回到北京時，即一九〇九年的夏季。對此，伯希和也自己說得很明白，一九一六年由法國金石文藝學院出版的大部頭書「關於東亞細亞之記載」（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的第二冊，發表了一篇就伯希和帶回的敦煌古書之一「尚書釋文」斷片所作的長文考證，在一五六頁記載著：「一九〇九年，在北京一些博學者前展覽這斷片」，一九〇九年即明治四十二年。敦煌古書之事從此便成熱門。也有部分書籍記載伯希和抵北京前，中途在上海、天津披露了敦煌古書，這也是錯誤的。一九一六年即大正五年，伯希和再到中國之事，這在時間上已經很晚。當時，伯希和在上海邀請各種學者，大言炎炎地使大家如入迷魂陣。被邀者之一的葉昌熾，在其日記中寫得很有趣。那就是「緣督廬日記」中，丙辰，即民國五年六月廿二日的記事。諒必是把當時之事混淆了，才生出了現在這種說法。伯希和於一九〇八年獲得千佛洞古書之後，在百忙中對派遣伯希和探險隊出力最大的最高責任者，即聞名的梵語學碩學索納爾（E. Senart）寫了詳細的報告函。發信日期是一九〇八年三月廿六日。其中一部分以「甘肅再發現的一個中世紀書窟」為題，刊載於一九〇八年的遠東法國學院彙刊第八卷第三——四號（“B. E. F. E. O” Tome VIII. Nos 3-4）因為是一九〇八年七——十二月號的，所以敦煌古書應說是憑此雜誌最早被知悉的。但此雜誌究竟在何時發刊呢？似乎相當後的事。明治四十三年即一九一〇年七月發行的京都文科大學機關雜誌「藝文」第一年第四號，刊載羽田亨博士的「伯希和氏的中央亞細亞旅行」一文，附有「敦煌石室遺書發見的次第」副題，介紹了當時最新的消息。但對於伯希和致索納爾的信函，卻沒有過目的跡象。據此，似可推斷其發刊是相當遲的。無論如何，敦煌古書引起轟動，似乎是以伯希和在北京將部分展示於中國學者為嚆矢。又羽田博士「伯希和氏的中央亞細亞旅行

」一文，今天已成為很貴重的文獻。對剛才所說伯希和的動靜，記載雖然簡單，卻很正確。後來多數學者為什麼致誤？尤其今天被稱為敦煌學大家的學者中，也有將其誤會的人，這是頗令人費解的。僅僅一年之差，似乎無關重要，但對敦煌古書研究的歷史而言，乃是個重大的問題，所以多費了口舌。

對於伯希和返回北京之事，現在有人留下了貴重的紀錄。那是東京專賣漢籍而著名的文求堂書店老板——田中慶太郎先生。田中先生於去年，昭和廿六年九月謝世，享壽七十二歲。他於明治四十年左右，曾在北京開店數年，而於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拜訪過伯希和先生，承其披露敦煌古書。這是日本人親眼看到敦煌古書的第一人。而田中先生將當時的見聞記，以救堂生的筆名刊載於日僑在北京發行的「燕塵」雜誌第二卷第十一號。題目是「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發行時間是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田中先生的文章，今因「燕塵」雜誌已經不易看到，幾乎無人知曉。不料兩年前，據聞在名古屋有人保存著完整的「燕塵」，經託某友人費盡苦心借閱過。此事在田中先生謝世前不久曾和他談起，他很興奮地說：該雜誌於關東大震災時被燒毀，自己手邊已無，因而感到無限的懷念。諒必諸位也不知道，所以在此把它念一遍：

「據聞法蘭西東方考古學校（在東京河內）教授 Paul Pelliot（伯希和）氏獲得甘肅省敦煌縣石室中所藏經卷古文書類，在返回其本國途中逗留北京，隨即拜訪先生於八寶胡同寓所。與他原素不相識，不知是否允予相見？此時聽到僕人一聲『請』，乃走進客廳。他是卅歲左右的青年紳士，頗具學者風度。因我不懂洋話，他便以流利的北京語和我會談。談話中始知，因透過他的友人薛萬努（シヤバンヌ）氏、梅託爾（メートル）氏等的介紹，已知我的姓名和職業，所以非常方便，得以毫無顧慮地暢所欲言。

先生是以研究清國西陲的地理古蹟等為目的，於前年由本國出發，經露領中央亞細亞入新疆省。在庫車八個月、烏魯木齊兩個月、吐魯番數週，從事研究，在烏魯木齊會見了長將軍，聽到敦煌石室的話。乃經巴里坤、哈密，出安西，承某知州贈送古寫本一卷，斷定是唐寫本。所以去年冬到敦煌逗留三個月，獲得了三危山下石室所藏的寫經及其他東西。

他說大部分已寄回本國，所以僅出示其手提行李中的數十件，所見雖是唐寫本、唐寫經、唐刻及五代刻經文、唐拓本等，卻都是驚心駭目的貴重品。紙質看來似乎不出黃

麻、白麻、楮紙等三種。老子化胡經並不遜於天平經中之最優良者。尚書顧命殘頁的文字雄勁有力，的確是唐人之書。西夏兵革時封在石室迄今。在室者都是五代以前之物，宋以下者一無所有。尤其有西夏文字者，半片皆無，這是確鑿的證據。我認為這是學術上很大的發見。自己雖對其內容全無使其發生效用的知識，但以欣賞的眼光來看，也是件件都令人不忍釋手的珍品。以先生帶來了奇籍，北京士大夫中的學者，以及對古籍具有興趣的人都接踵拜訪伯氏的寓所。而看到了帶來之珍品，無不驚異。本想以自己的筆記簿把它紀錄下來，但與我們前前後後看過的人當中，有羅叔言氏所紀錄者，因比我們所見更為正確，特轉錄於左：「

田中先生在此插入羅叔言氏——即羅振玉先生所寫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為題的漢文文章，並加註了田中先生本人的一點意見。現在暫且把它從略，繼續念下去：

由北京讀書人主辦，於九月四日假豪華（グランゲ）飯店舉行了歡迎會。當日出席者計有：寶侍郎、劉少卿、徐祭酒、柯經科監督、惲學士、江參事、吳寅臣、蔣伯斧、董比部，其他十數名，真是一時名流咸集的盛會。但羅叔言氏卻因患微恙而缺席，實為憾事。惲學士起立向伯希和氏舉杯，表示羨慕其因對斯學的熱心，而得天如斯嘉惠。伯氏即謙辭以自己不過是為研究而由國家所派遣，偶然獲得寶物，現在雖歸法國政府所有，學問應為世界公器，故對有意攝影、謄寫者當盡力應命云云為答。先生與北京士大天應酬後，於九月十一日晚搭前門發的列車，經西伯利亞踏上歸途，以後必將有各種報告發表。

田中先生的文章至此結束，當時的情形，一一躍然紙上。北京學者的驚異，必然是很大的。出席伯希和歡迎會的寶侍郎是滿洲人，就是當時擔任學部侍郎的寶熙。徐祭酒是徐枋；柯經科監督是以「新元史」著者而聞名的柯劭忞；江參事是江瀚、字淑海，是「毛詩」專家。蔣伯斧本名繡，是音韻學者，董比部是曾數度來日，各位所熟悉的董康先生，大多數與當時新設於北京的京師大學堂有關係者。羅振玉先生當時也在擔任京師大學堂的農科大學監督。又有王仁俊者，在此雖未舉出他的名字，無疑的也是他們的同志之一，他不久出版了「敦煌石室真蹟錄」這本書，江蘇省吳縣蘇州人，字捍鄧，他是與蘇州出身的學者，也與敦煌學有關係的曹元忠並稱的人物，對文字學造詣很深，當時仍在京師大學堂主講「爾雅」、「說文」，兼任學部編譯圖書局次長。總之，這些人看到敦煌古書，無不感到驚異。其中以羅振玉、

蔣伯斧、董康等人爲最。而由羅振玉、蔣伯斧這些人開創了中國的敦煌學。關於敦煌古書，隨即由田中先生、羅振玉先生向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及狩野君山先生轉告。當時內藤、狩野兩位先生都任職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而住在京都。因此在日本，特別由京都開創了敦煌學。又伯希和先生依田中先生的文章，說他是九月十一日晚出發的。中途暫住蘇俄，然後於十月廿四日安返巴黎。當時在巴黎也很轟動。隨即在金石文藝學院舉行歡迎會。繼而十二月十日在巴黎大學索爾朋文學部（Sorbonne），由法國亞細亞協會與地理學會共同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大盛會。聽眾人數超過四千，巴黎大學文理學部的講堂大階幾無立錐之地。在居於派遣伯希和探險隊最高責任者地位的索納爾主持會下進行，首先由伯希和報告探險隊行動的大概情形。當時的詳情見於遠東法國學院彙刊第十卷第一號二七二頁（“B. E. F. E. O” Tome. X, Nol. P272），就這樣，在法國也由於伯希和的回國，而同時興起了敦煌學。敦煌學在中國、日本、法國這三個國家，幾乎同時興盛起來。當然敦煌古書及其他壁畫等，除伯希和以外，斯坦因也有帶回。這些文物，於一九〇九年經印度送交大英博物館後，即一直被放在博物館地下室，並未加以整理。自然，英國的敦煌學就稍爲落後了。

法國與英國的姑且不提，究竟日本的敦煌學是怎樣興起的呢？擬就當時的情形再爲詳談。剛才說過，從敦煌發見了爲數甚多的古書一事，由北京羅振玉先生、田中慶太郎先生迅速通報內藤湖南先生與狩野君山先生。從此以京都爲中心，在我國開創了敦煌學。似乎在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東京、大阪兩朝日新聞刊登一篇標題「敦煌石室的發見物」的報導。這是在我國報告敦煌古書的最初記事。掀起了當時學界的大轟動。

敦煌石室的發見物

△千年前的古書卷十餘箱

△悉數被法國人帶走

由清國文部參議官羅振玉氏致東京某氏的報導，帶來了足以聳動學界耳目的大發見。據報導，該國甘肅省敦煌縣東南三危山下小川前有三座寺院。當地人稱爲上寺、中寺、下寺。上中兩寺住道教方士，獨下寺屬於僧刹。距寺左邊不遠處有數百石室。此石室自唐代即已聞名。俗稱千佛洞，文人稱爲莫高窟。一如千佛洞之名，各洞中都有壁畫。上截塑有各色各樣的羅漢佛像，下截再刻佛像與彫刻者畫像及其姓氏籍里。光緒二十六年（明治三十三年）擬修石洞，開鑿其中一石壁時，意外地發見裡面藏有無數書卷。於

是，其書始流落人間。惟因其地僻處極西，猶未引起世人注目。光緒三十三年（明治四十年）冬，駐在北京的法國傳教士伯希和氏旅行清國西北邊新疆至迪化府之際，伊犁將軍長庚將前述石室之書一卷贈與伯氏，並提及該項發見的事實。伯氏繼續南下入甘肅省，安西州牧某氏也贈與一卷。伯氏因長久駐在北京，對支那古書具有莫大興趣。一見而確認其為唐代寫本，即到石室之處，廣泛的搜購了十餘箱。這不過是原數量的三分之一，其三分之二早已散逸，無由收回，實為可惜之至。伯氏將其攜回北京，然後將經史子集四部各書及經卷中精好者立刻寄回法國。因此，羅氏僅能於上月下旬看到殘餘的數卷而已。據羅氏推斷，這些古書當係西夏兵革時所藏，即屬於九百七十餘年前的古書卷。只此一端，已彌足珍貴。何況佛教的衰頹是在五代兵亂之際，而所匿藏的古書卷中有關佛教者特多。準此，或許為時更早，應是一千餘年前的古書卷。伯氏送回法國的書目大約如左：

顏師古玄言新記明老部五卷。二十五等人圖。大公家教。辨才家教。孔子修問書。天地開闢以來帝王記。百行章。何晏論語集解一、二、六卷。毛詩卷九（鄭注□柏舟故訓傳）。范寧穀梁集解（閔公至莊公）。孟說秦語中晉二。莊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郭知言記室修要。文選李善注第二十五、二十七卷。冥報記。新集文詞教林。秦人吟。子賦。李若立略出羸金。老子道德經義疏第五卷。唐韻。切韻。（小板五代刻本。均殘）。唐禮圖。輔篇義記二卷。李荃問外春秋一、四、五卷。唐律一卷。故陳子昂集八、十卷。敦煌十詠。

右列無一不是珍本。其中如唐韻切韻的五代刻本，足以推翻刻本始於宋代之學者定論。又羅氏所見多屬經卷拓碑類，而尚書顧命的殘本及化度寺窣禪師碑等，實足使具有考古癖的學者震驚。以竹製成的經帙，在我國已自京都高山寺及其他地方發現，不足珍奇。但在支那，實屬空前的大發見。

以上是朝日新聞的全文。雖未署名執筆者為誰。但可以推定是與朝日新聞關係較深的內藤湖南先生所寫的。因刊此記事，經十二日後的十一月廿四日至廿七日四日間，由內藤湖南先生署名，以「敦煌發掘的古書」為題的長文解說載於朝日新聞。其中曾有「不久以前曾在報上載其大略」一語，由此推察，十二日的記事無疑的，是為內藤先生所執筆。據此，先生最初是由東京某氏聽到羅振玉的報告。所謂某氏，乃當時在東京本地經營書肆文求堂的田中治兵

衛老人。諒係田中慶太郎先生的父親。而這十二日的記事，似乎是以羅振玉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爲基礎的。此事在廿四日的「敦煌發掘的古書」開頭也有了很明白的交代。諒必內藤先生是最初披閱羅先生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乃據此執筆而寫成朝日新聞十二日的記事。當時對於發見敦煌古書的伯希和似乎也不十分清楚，僅稱其爲法國傳教士。然而，不久北京的羅先生又將新刊行的「莫高窟石室祕錄」一文送到內藤先生及狩野先生處，更將照片也送來。結果，乃有廿四日至廿七日朝日新聞連載的「敦煌發掘的古書」記事。以茲與十二日的記事比較，實有很大的差別。有關伯希和的事也已補正過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言及京都大學文科大學的諸教授間已開始敦煌古書的研究之事。即我國敦煌學乃是從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中旬才起步的。已是距今四十四年前之事。又內藤先生「敦煌發見的古書」這篇文章，現在全文採錄於先生的「目睹書譚」，很容易看到。它與剛才念過的十一月十二日朝日新聞記事「敦煌石室的發見物」同爲回顧我國敦煌學呱呱落地時之情形的第一手歷史文獻，希望各位都能一讀。

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廿八、廿九日，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假現在岡崎的府立圖書館二樓召開第二次總會。同時陳列由北京寄給內藤，狩野兩位先生的敦煌古書照片，供大家觀覽。該圖書館當時新建不久，爲一新穎的建物，所以頗具引起大家的魅力，加上朝日新聞記事的奏效，盛況非常。而廿八日京都大學的諸教授交互登上講臺，擔任說明。首先由小川教授以「總說及地理」爲題，由中央亞細亞探險史兼及伯希和的敦煌旅行，說明了敦煌的地理。接著由內藤教授說明「西州志殘卷、唐太宗溫泉銘」；高岡講師說明「尚書顧命、尊聖陀羅尼、金剛經、化度寺碑」；濱田講師講「壁畫、雕刻」，羽田講師講「摩尼經殘卷」；狩野教授講「老子化胡經」；桑原教授講「景教三威蒙度讚」。當日，不但是陳列古書照片，還有雕刻繪畫的照片，以及很多各種參考書與拓本等，其陳列品據說多達三百餘種。這一史學研究會的活動，因公開了敦煌古書的照片，而引起大家莫大的興趣，轟動一時。當時我是甫入中學的一小孩，對此當然妄無所知。但是我的祖父是跟著大夥到處大嚷敦煌敦煌的人羣之一，我也被祖父帶去參觀史學研究會的展覽。總之，當時非常轟動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深。對於當時諸位先生的演講，早經濱田青陵博士於翌年明治四十三年一月廿日發行的「東洋時報」第一三六號以「關於敦煌石室發見的古書畫」爲題，介紹其大概。又「史學雜誌」的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號及四十三年一月號，以及「史學研究會講演集」第三冊等，都附當日的展

覽品目錄，並有詳細的記載。回想當時，有如幻如夢的感覺。

在中國而言，敦煌古書的發見也是對當時學者的一大刺激。對此研究特別熱心的羅振玉先生，可能是在一九〇九年七月或八月之間，很快地發表了前面一再提過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它雖是僅僅八張極簡單的東西。但在敦煌學史上實為值得紀念的最初文獻。有誦芬室校印字樣，因此可能是董康先生所付印的。羅先生這篇文章，隨即被轉載於當時上海商務印書局出版的「東方雜誌」一九〇九年九月號。隨後不出數月，羅先生又相繼出版了「莫高窟石室祕錄」，再加以訂正增補為「鳴沙山石室祕錄」，刊載於當時由上海出版的「國粹學報」。又將其抽印，以單行本的體裁出版。這兩本書都是很薄的單行本。翌年宣統二年——明治四十三年初，又與友人蔣伯斧共同發刊了四冊很精闢的「敦煌石室遺書」。這時候，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蹟錄」也已出版。於是敦煌學在清國也忽然興盛起來了。清國這一形勢隨即傳到了日本。對於內藤先生、狩野先生等被揶揄為敦煌派的這些學者，給與莫大的刺激。明治四十三年二月，適值當時任職東京帝國大學國史學助教授的黑板勝美博士完成兩年的歐洲留學返國，將西洋人帶回歐洲的各種中央亞細亞出土品有關新見聞傳給日本學界。黑板博士雖是專治國史的，但是對東洋古文書、美術品也非常關心。因此將路寇格(Le Coq)帶回德國柏林的民俗博物館及斯坦因帶回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的文物，分別細心地考察過。返國後不久，於明治四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假東京市帝國大學山上御殿召開的文字研究會——在此前年創立，以中國古代文字的研究為主的會——席上，將其見聞的大要，以「歐洲的支那考古學研究」為題；作了一次演講。其筆記登於當時創刊的「漢學」雜誌第一編第一號。序文中文字研究會變成文學研究會，這是誤排。依同號的彙報欄一見便知。拜讀他的演講筆記，當知他在大英博物館地下室看到了斯坦因第二次中央亞細亞探險時，從敦煌帶回繪在絹上的佛畫、壁畫等美術品，以及聞名的唐咸通九年的金剛經版本，類似書儀的文書類，又在敦煌附近的漢代烽臺遺蹟發掘帶回的漢簡實物等。尤其黑板博士從古文書學方面的觀點，特別對於木簡加以深切的注意。他將今日專家學者間所週知的有名的「急就章」木簡、又後漢永和二年的「玉門官縣次行」木簡等三項木簡，一面出示其圖，一面將其貴重性——加以說明，真是有趣。這些東西，便是最初介紹到我國學界的。結果，使我國學界認識了中央亞細亞出土品在學問上的重要性。黑板博士這篇演講筆記，在歷史上是如此重要的文獻，卻未被採錄於博士論文集「虛心文集」。因此今天幾乎無人知曉，實為憾事。我多年來

受黑板博士的厚誼，而博士與京都的內藤先生、富岡先生等老早就有深交，曾不斷地接觸過，因此博士所帶來的那些新的見聞談，無疑的也刺激了京都的敦煌學派。

又有一樁不但刺激了敦煌派學者，更使一般人刮目的，是由西本願寺大谷光瑞上人所進行的西域探險隊帶來的文物，在那時候陸續到達京都。因詳述大谷探險隊的事，非我今天演講的主要目的。而且剛才禿氏先生也已談到，所以在此只想作一簡單的說明。明治四十一年橘瑞超先生作第二次中亞探險，試行吐峪溝、喀喇和卓、寬車河、庫姆都拉、和闐等地的發掘，達兩年之久。明治四十三年二月，野村先生順利返國，其帶來的文物也到達了京都。正逢日本，尤其京都的敦煌熱在如火如荼上昇的當兒。當時帶來的文物有聞名的西晉元康六年所寫的「諸佛要集經」，北涼的西域長史李柏文書、從吐峪溝發見的天寶十載及有大曆六年題識的佛畫等，很精彩的遺物，為數甚多。而由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松本文三郎、狩野直喜、桑原隲藏、小川琢治、內藤虎次郎、榊亮三郎、富岡謙藏、濱田耕作、羽田亨等諸教授及東京帝國大學的美術史教授兼京都大學講師瀧精一博士從事其調查工作。早在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三日至六日三日間，由內藤先生將其調查的大略，以「西本願寺的發掘物」為題，在朝日新聞予以介紹。又將發掘物的一部分，在光瑞上人的別莊大甲二樂莊公開展覽，更引起一般人對敦煌，中央亞細亞等地遺品的興趣。從前對敦煌古書雖轟動一時，但未曾目睹實物，僅依照片大事喧囂。然而西本願寺西域探險隊所帶來的文物，直接可以看到了西域發掘的實物，因此，大家的驚異是無比的。於是堪稱敦煌研究大本營的京都大學的文科大學，為調查敦煌古書，而派遣了很多教授到北京。然則，為什麼要派教授到北京呢？必需從它的理由說起。

如前所述，從敦煌千佛洞發見的古書，被斯坦因、伯希和兩人分別帶回英國及法國。然而，藏於千佛洞的古書，數量很大。斯坦因、伯希和帶回後，尚留有很多。清朝政府獲悉在敦煌發見了很多古書，而且大部分被帶回西洋，當時雖已陷於奄奄一息的狀態，但也不能置之不聞不問。況且有李盛鐸、劉廷琛等大官的建議，乃將留存於千佛洞的古書全部運回北京，而到達了學部。所謂學部，即相當於日本的文部省。為了調查這些到達北京的古書、京都大學的文科大學決定派遣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小川琢治等三位教授與富岡謙藏、濱田耕作等兩位講師。以今天的情形而言，大學的五位教授出差到北京，並非一件值得驚奇的事。但在當時卻是空前的大事。同僚的鈴木豹軒先生還特地作了一首七律相贈。狩野、內藤兩位

先生也曾次韻酬答。可說是凝集了當時大家視聽的一件大事。這五位先生於八月下旬出發，到十月中旬才返國。不過，其中小川教授與濱田講師在北京逗留中，曾旅行河南省洛陽視察聞名的龍門石窟，而且歸途繞道滿洲，因此較晚才回國，當時五位先生所採取的行動，由小川博士以「北支那旅行概要」為題，刊載於「地學雜誌」，又瀧精一博士也由其所主持的國華社派遣到北京，與京都的五位先生大體上採取同一行動。但是瀧博士似乎以調查端方所藏品為主。端方這個人是辛亥革命時，第一個在四川被殺掉而出名的，滿洲出身，而頗具勢力的大政治家。他喜愛書畫、骨董，當時被譽為清國第一個古美術品收藏家。在端方家所看到的東西當中，有從敦煌送來的唐畫觀音像等，似乎頗引博士的注意。因此博士對敦煌畫漸感到興趣，後來由博士門下的松本榮一博士所繼承。京都的五位先生，對那些敦煌畫當然也注意到。但是無論如何，還是以古書為其主要目標。

關於這五位先生的調查，翌年明治四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十二兩天，在京都大學文科的九號教室舉行了盛大的報告展覽會。因一般人正在為敦煌、敦煌而狂熱的當兒，此刻不但是學界，連一般社會也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現在帶來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報告展覽會目錄」，就是當時分發給來會參觀者的目錄。另外還有一物請各位參閱，那是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的朝日新聞星期副刊。當時的朝日新聞星期副刊滿載著有關學問啦，藝術啦等等特別精彩的記事。一般知識分子每週都以讀此為樂。在這副刊上，以「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告展覽號」為題，寫滿了整整兩頁，而且諸教授所拍回來的，敦煌古書及很多送來的文物照片等，也大幅地登了出來。這篇報告，大體上是由內藤先生執筆，實為敦煌學史上極為貴重的文獻。所以前年出版先生的「目睹書譚」時，我曾建議把它併印進去，現在已載在「目睹書譚」中，如有興趣者，敬請一閱。這次展覽會非常的轟動。因此我雖不甚了了，也曾去參觀過。而朝日新聞的星期副刊也很小心地把它保存下來。就是今天帶來的東西，這次展覽會雖轟動一時，但對敦煌古書而言，似乎有些令人失望之處。這在報告書中也有很坦白的交代。其故安在呢？大體上，敦煌古書已由伯希和、斯坦因兩位先生將其重要的部分帶回，其餘的幾乎全是佛教經典。因此運到北京學部的敦煌古書，數量雖有五、六千卷，幾乎是佛典。後來才發現，由敦煌運北京途中，被竊去了其中特別珍貴的東西。當時清朝已瀕臨滅亡前夕，國家綱紀紊亂。因此這樣的事也就毫無顧忌地發生了。據說：在中途大量竊取珍品的，即是向政府建議，將斯坦因、伯希和所遺留的古書收回北京的李盛鐸與劉廷琛兩

人。真是令人詭異。據云：獲悉此事的學部侍郎寶熙大爲震怒，本擬上奏，適值此時起了辛亥革命，終於不了了之。總之，運至北京學部的古書中，很少有珍品。因此辛辛苦苦的出差到北京，以敦煌古書爲主要目標的調查，卻感到有些敗興而回。然而，一般的敦煌熱並未衰退，益見上昇。

正當京都大學諸先生出差北京的同時，在我國出現了敦煌學史上值得誇耀的空前著作。那是藤田豐八先生的「慧超傳箋釋」這本書。藤田先生曾經於明治廿八年與狩野君山先生同時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明治四十二年被清國政府聘爲當時新設立的北京大學的教官，而住在北京。所謂「慧超傳」，詳言之，即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係唐開元時代留學於唐的朝鮮新羅出生的僧人慧超，旅行到印度，四處巡禮釋迦聖蹟後返唐的往復紀行。這書早經佚失。伯希和在敦煌發見其殘卷，而把它帶回法國。當時，伯希和認爲是一件貴重的文獻，特將其照片披露於羅振玉。羅先生乃依其照片，將本文收錄於「敦煌石室遺書」，並附有羅先生的簡單札記。藤田先生再深一層的研究，完成了「慧超傳箋釋」這一漢文的註釋。自從發見敦煌古書以後，出了種種對這些古書簡單的解釋或介紹。但特取其中之一，從學問上發表了正式而徹底的研究者，以藤田先生的「慧超傳箋釋」爲世界最初者也不爲過。藤田先生對此研究所費的苦心，必然很大。何以故？伯希和披露於羅振玉的照片似乎非常不清晰，而收錄於「敦煌石室遺書」中的「慧超傳」本文又是錯字連篇，藤田先生根據這種惡劣的寫本，居然完成了那樣精闢的研究。先生的「慧超傳箋釋」這本書，從敦煌學的歷史而言，實爲世界上最初出現的精闢著作，卻由我們日本人所完成，使我們感到驕傲。當然，藤田先生這一研究是在北京進行，而於明治四十三年秋在北京出版的。今天通行的「慧超傳箋釋」，是翌年四十四年藤田先生重加訂正後，而在東京印行的再版本，或昭和五年將再版本重在北京影印的。至於初版本是在北京出版的。京都大學的諸先生也將初版本帶回，於翌年二月報告展覽會上把它展出。不用說，出版了這樣精闢的書，又成爲刺激日本內地學者的一個原因。

繼明治四十四年二月十一、二兩天的京都大學展覽會之後，在京都另將西本願寺西域探險隊帶來的文物，尤其是壁畫、繪畫等，在我現任的京都國立博物館——當時稱爲京都帝國博物館——公開給大家。對於繪畫方面，瀧精一博士於明治四十四年五月，在東京史學會例會席上作了一次「關於新疆發掘的繪畫」的演講。內藤先生在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三日至六日

刊載於大阪朝日新聞的「西本願寺的發掘物」記事中，對這繪畫也曾說明。但是像瀧博士這樣的專家所發表的研究，似乎更加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明治五十四年春，可說是我國東洋學進步上的劃一時代。由東京白鳥庫吉博士創刊了「東洋學報」，這一刊物在當時堪稱是空前的高級專門雜誌。當時新進氣銳的羽田先生，在該誌刊登了一篇「大谷伯爵所藏新疆資料解說」的論文。這又引起了很大的注目。這一篇論文題為第一回，似有繼續出刊的意思。但不知何故，僅刊出了第一回。而在第一回所舉出的便是聞名的北涼李柏文書。其實物今天已陳列於別室，各位諒已過目，實屬稀世的珍品。因此，明治四十四年春，對於西本願寺西域探險隊所帶來的繪畫啦、文書啦一時喧囂塵上，自然對於與它近緣的敦煌遺物被攜往西洋，更加一層的騷動。

此時，又從清國傳來了有關未被攜往西洋的敦煌古書的種種新情報。其中之一，是由法國伯希和將很多敦煌古書的照片寄達端方的情報。端方其人對敦煌古書也具有莫大的興趣。在聽說已經流落海外後，感到遺憾，因致函伯希和，請將部分出讓給中國政府。伯希和雖未答應他的要求，卻將照片寄給他，這一情報從北京傳來。明治四十四年四月發行的京都文科大學的「藝文」在其彙報欄中有「去年末，由法國伯希和氏寄給北京端方氏的敦煌遺書照片數十種，達一千張左右」云云。並載有照片的目錄。這可能是內藤先生依據羅振玉先生的私函所寫的。不久，又由羅振玉先生寄來在北京新創刊的「國學叢刊」雜誌。該刊也載有寄到端方的敦煌古書照片目錄。另一樁刺激內藤先生及狩野先生的，是在「國粹學報」連載著當時很活躍的少壯學者劉師培的一篇以「敦煌新出寫本提要」為題，且相當詳細的研究報告。這也是根據伯希和寄給端方的照片而作的，其論文連載八回。敦煌古書之如何的貴重，其實際情形經此說明已是歷歷擺在眼前。因此，內藤先生與狩野先生再也無法袖手旁觀，這是可想而知的。終於翌年大正六年秋，京都大學的狩野先生出差歐洲，從事倫敦、巴黎的敦煌古書之調查。與此同時，東京大學的瀧精一博士也前往歐洲調查他所專門的繪畫。

明治四十四年春，真可說是盛況空前。松本文三郎先生就狩野先生與內藤先生前年從北京帶回的佛典，作了詳盡的研究，連載於「藝文」。而與龍谷大學有深厚關係的妻木直良先生，也幾乎同時將一篇「敦煌石室五種佛典的解說」論文登載於「東洋學報」。這又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敦煌石室這五種佛典，是當時由清國派來的駐日公使汪大燮所持有，而妻木先生是在東京看過的。這些經典，也許是前面所提過的，那位李盛鐸他們所竊取的一部分。就

這樣，敦煌古書的實物也漸漸地流入了我國。到了大正時代，矢吹慶輝博士兩度赴倫敦。把斯坦因帶去的古寫經大量拍攝照片帶回。直至昭和五年，遂完成了那部龐然大冊的「鳴沙餘韻」。關於漢籍方面，雖未能如佛典那樣作完整的研究。不過，大正元年訪問倫敦、巴黎的狩野先生曾抄寫了各種貴重的材料回來。尤其對中國俗文學研究方面，作了很大的貢獻。隨後，大正八年至十年，羽田亨先生留學法國。結果，於大正五年與伯希和先生共編「敦煌遺書」第一集出版。分爲景印本與活字本兩部分。景印本部分是以前述「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爲首，將三種古寫本原樣景印，而活字本部分即以「沙州地志」殘卷爲首，將九種古寫本的本文用活字排印，並附有羽田先生簡單的解題。這真是很好的書。可惜僅止於第一集，第二集接受出版的東亞考究會因有事故，終未出版，實屬憾事。繼羽田先生之後，大正十三年藤田湖南先生也前往歐洲，帶回大量的貴重資料。內藤先生旅行中，石濱純太郎教授也一直隨行。石濱教授是我國敦煌學的重鎮。他於返國後大正十四年夏，在大阪懷德堂嘗試過三次「敦煌石室遺書」的暑期講座演講。當時曾將其筆記以單行本發行。後來略加訂正，收錄於教授「談東洋學」這部著作。乃是對敦煌學具有興趣者必讀的文字。內藤先生的敦煌古書調查，發現了各種貴重的東西。尤其披閱了伯希和帶回私宅，未曾示人的貴重古書，並且帶回大量的照片。後來先生的健康欠佳，終於與世長辭，真是遺憾。繼內藤先生之後，於昭和初期，京都大學的小島祐馬先生也留學巴黎，調查過很多伯希和攜歸的敦煌古書。並將其結果以「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錄」爲題，先後九次發表於「支那學」雜誌第五編第四號以後。小島先生又依據當時所看過的，以及存在於日本的敦煌古書，另行選定專屬於諸子者，於昭和四年由高瀨惺軒先生還曆紀念會出版了「沙州諸子二十六種」。但是這本書似乎尚未公佈於大眾。又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大谷勝真教授、九州帝國大學重松俊章教授也在看過巴黎、倫敦的敦煌古書之後回來。我也附驥於諸位前輩，於昭和十年至十一年逗留巴黎年餘。一方面調查敦煌古書，同時大量拍攝照片，完成了「敦煌祕籍留眞」及「敦煌祕籍留眞新編」兩本書。其他，還有很多留學巴黎、倫敦，分別看過若干敦煌古書回來的學者。其中著眼於不同方面，而完成了最大業績的，便是京都大學的那波利貞教授。大體而言，調查敦煌古書的學者，最初大多是注意佛典、漢籍等。而那波博士卻大量抄寫史料的文書回來。正好配合了我國學界興起社會經濟史學的風氣，給與很大的貢獻。又瀧川政次郎博士、東京東方文化學院的仁井田陞博士等，雖未曾留學歐洲，身在日本，卻對這一方面也表現了輝煌

的成就。敦煌古書中，有用維吾兒文、西藏文字等非漢字的文字書寫，難讀的文書很多。對這一方面，羽田先生表現了很大的成績。其次是繪畫方面，東京的松本榮一博士出版了一本很大的書「敦煌畫的研究」，而獲頒學士院獎。其他，在這方面雖沒有像松本博士那樣的專書，但小野玄妙博士也有很多精闢的研究。其功績是足堪認定的。以上僅舉出較顯著者，另以各種小論文發表而有成就的研究學者也很多。在此無法一一列舉。我於前年，將這些有關敦煌的著作、論文等，依年代順序編排，作成文獻目錄。現在尚未出版，擬於近期加以訂正增補後再行發表。

回顧我國敦煌學，五十年來在各處的領域裏表現了相當精彩的成績。這一點較諸西洋、中國並無遜色。然而最初談到的殷墟發掘，自明治三十二年以來，其發掘地點逐漸擴大，結果挖出了種種珍品，其研究也似乎一天天地興盛起來。敦煌方面，因探險隊的工作已告結束，最近再也不像殷墟的研究那樣多彩多姿。然而，伯希和、斯坦因兩氏從敦煌帶回的東西，以及存在於中國及我國的敦煌遺物，都尚未全部被研究過。再包括廣泛的中央亞細亞的遺物——即在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前後前往中央亞細亞探險的路寇格（A. Von Le Coq）、格蘭威德爾（Grünwedel）、寇茲羅夫（P. K. Kozlov）等攜去的文物，數目實在很大，而今天都散逸在世界各地。我們很想調查那些東西，再次使敦煌學開出美麗的花朵。最近傳聞：中共的敦煌學很盛，已經成立研究所。在已有飛機的今天，前往中央亞細亞非常容易。只因政治關係，無法前往該地。敦煌學不但尚有研究的餘地，更有輝煌的將來。今天的講題雖是敦煌學五十年，實際上只是五十年歷史的第一頁。其餘似乎是在走馬看花式的，快速地跑過而已。謝謝大家長時間的聽講。